

2022年9月17至18日，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联合主办，商务印书馆、《浙江学刊》编辑部协办的“第一届古典学与经学年度论坛”在杭州六通宾馆召开，本次论坛以“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快乐”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等六十余位学者围绕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快乐、自然与德性、礼乐之乐、自然与礼法等议题，在线上线下展开切磋与研讨。



张志强主编表示，国学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的冲击而形成的学术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与中华文明的自我特殊化有关，而古典学则是尝试将我们的学术传统重新纳入一个更具普世性的框架来理解自己的文明独特性。张主编指出，

本次会议将“古典学与经学”设定为主题，很好地把握住了在时代条件下“辨章学术”的使命，同时也预流了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指示了一条中西学术传统交流互鉴的道路。他衷心希望，本次会议的辨章学术能够切实实现考镜源流的作用，真正把握住中华学术的大本大源。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在会上谈了《论语》中的“乐”。他表示，孔门之学的精要在于礼乐，以此贯通古今。《论语》中的“乐”字有礼乐之“乐”与心情之“乐”，两者有其关联。《论语》承袭六艺，成为君子致力于持守“仁”的教科书，其核心思想是从“礼”到“仁”，完整链条为由礼乐(yuè)到仁，而“乐”(lè)是“仁”的生发状态。《乐记》称“乐(yuè)者，乐(lè)也”，又称“乐至则无怨”，又称“仁近于乐”，可见其中的线索。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在《渴望不朽与纵浪大化——陶渊明〈形影神〉主旨新探》中指出，陶渊明之《形影神》对于理解其思想，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对此组诗的具体理解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无论是清人马璞，还是近人陈寅恪和逯钦立，都认为此组诗颇为难解。唐老师认为，渴望不朽是《形影神》的主题，他将《形影神》的写作置于东晋末、刘宋初有关形神问题与报应问题的争论语境中加以分析，重构陶渊明对形神问题与报应问题的看法，指出陶渊明其实持神不灭论，但又反对佛教的报应论与轮回说。在此基础上，唐老师重新解释了“纵浪大化”的真实含义，指出其与庄子的自然说与生死观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的确道尽了陶渊明一生心事。

柏拉图哲学中的快乐、德性与幸福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在《快乐抑或德性：柏拉图论幸福的充要条件》中谈道，苦乐感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情感，涉及人的德性完善和幸福。从古典哲人柏拉图的视角看，个人应首先形成正确的苦乐感和良好习性，方能朝向有德的生活。理性反思能使人从追求身体的快乐转向沉思的愉悦，从德性的完满获得更大的内在满足即真正的快乐。人要获得幸福和灵魂的和谐应求索完整的德性，德性本身具有内在的永恒价值。有序且优异的灵魂天然令人敬佩，正是对高贵和美好之物的向往之情，对洞彻宇宙万物的深切渴望，使人不会仅限于快乐、功利的视角看待个人的幸福。古典哲人力图将政治德性与个人德性融合起来，强调个人灵魂应保持温良、稳健，城邦政制应保持节制、合宜，以免走向极端化而彻底衰败。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樊黎老师做了题为《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报告。樊老师首先表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弱化了卡利克勒斯的说辞，重在阐发卡利克勒斯所谓的“自然正义”，强调尼采意义上的主人道德。樊黎老师旨在解读《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的立场，从政治层面看，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反映民主制和民主

制个人的特征及其向僭主制转化的内在倾向；从哲学层面看，卡利克勒斯快乐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人性基础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

吉林大学哲学系盛传捷老师的《〈普罗泰戈拉〉中的快乐主义》主要立足《普罗泰戈拉》来讨论苏格拉底是否是快乐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审慎的快乐主义，这要截然区别于无条件快乐主义。盛老师举例论证快乐在培养美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继而又总结出无条件快乐主义的弊病。他认为，苏格拉底审慎快乐主义要求理性的快乐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和谐，而一般的快乐主义原则则是欲望统治了理性，而追求欲望的快乐。这就造成了快乐主义的最大弊病：灵魂的堕落。

陕西师范大学张波波老师的《从快乐到善——柏拉图快乐观探微》思考了古典哲学与当代关于快乐本性及其价值的不同看法，指出视角分歧反映的不同时代主导的哲学去向和话语定位的差异。张老师重点探讨了柏拉图对快乐与善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他指出，柏拉图从不认为快乐问题归根结底是生理问题，故而快乐的价值并非完全取决于大小和量级，而是取决于纯粹性和真实性。这一关于快乐的深刻洞见对于当代关于快乐的讨论具有持久而深远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教授以“重思柏拉图的辩证法：以《理想国》为例”为题，集中论述了何为柏拉图的辩证法。为他结合柏拉图著作总结出“辩证法”的三重含义：问答式辩驳、结合与划分以及假设法。“辩证法”在《理想国》中的不同内涵，主要应用于“按类划分”、“线段喻的知识论”及其为哲人教育的拱顶石。彭老师得出结论，辩证法首先是友好交谈的技艺，其次是对理念和存在的探求，这使得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友好的辩难和不带妒意的问答”中走向真理。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俊松教授在《论柏拉图〈理想国〉卷四中的灵魂观》中表示，对《理想国》的解读要关注到思想的整体性。苏格拉底考察灵魂中是否具有与城邦三阶层相对应的三种形式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从可见事物过渡到不可见事物；二是诉诸于对立冲突律。灵魂三分论证处在城邦三阶层论证的笼罩下，因而苏格拉底不得不对灵魂进行划分。另外，苏格拉底在使用灵魂划分的方法时，举出的例子通常是特例，因而并不能代替灵魂的全貌。苏格拉底的论证疑点重重，但他对这些疑点有着自觉的意识。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武小西老师在《具身灵魂与练习死亡：柏拉图生命伦理思想探析》中指出，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呈现出一个张力：《理想国》和《斐德若》把灵魂描述成三分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了一套道德心理学理论。而《斐多》却则认为灵魂是统一的非构成物，以此论证灵魂不朽。武老师基于当下过度医疗的现实背景，试图从柏拉图对医学的规定出发，尝试为这种张力寻找一种生命伦理视角的化解方式。在她看来，灵魂的本质是通过练习死亡，把统一的理性从其具身的现实处境中萃取出来的动态过程，是运用理性实现灵魂本质的积极活动。

上海大学文学院肖有志教授带来《灵魂的马车：柏拉图〈斐德若〉（253c7-257a2）讲疏》。肖老师首先论述，灵魂的“三驾马车”说辞中划分出灵魂的不同型相，灵魂的型相学关联了灵魂学与形而上学，伦理问题是理解后二者之联结的关键。心智的观看是爱欲的源头和动力，灵魂内部同时产生分裂、冲突与对抗。驾御者、白马与黑马之间存在的张力指向灵魂中的统治力量（统治与服从）。热爱荣誉的灵魂中的“黑马”选取多数人以为是幸福的选择并且完成之，意指达到性满足或性快乐的目的；但出于无节制的爱欲的选择不可能是圆满的幸福，背后是爱欲与心智的分离。

广东省社科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万昊老师在《苏格拉底与常人克力同》中指出，《欧蒂德谟》真正的主题是教育克力同。苏格拉底希望克力同自己能够用美和好作为标准检验哲学，而克力同的无动于衷似乎表明了苏格拉底的失败。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不畏任何失败，甚至通过失败达成目的。在对话结尾，苏格拉底跨越了昨日对话与今日对话的界限，将对话者重新转向克力同。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王锴博士汇报的是《柏拉图〈斐多〉中的快乐主义辨正》。他首先从《斐多》开篇中的苦乐相反相随出发，引出快乐的真实性问题。《斐多》提出正确换取德性和快乐的方式在于依靠明智，却又反复强调明智不是我们人生在世能够切实达到的一种状态，这种看似对立的说法，一方面是通过规范如何正确获取快乐，在获取的逻辑优先性上突出追求智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在建构规范性的同时为快乐计算的现实性留有一定的余地，为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不同的快乐与德性教诲。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许雪晖博士在《论柏拉图的真正快乐》一文中提出，柏拉图围绕三个内在相关的层面提出了其对真正的理解。首先在快乐的纯粹性层面，柏拉图批评“痛苦的解脱”只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因为，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它并非真实的快乐，与痛苦相混合，是不纯粹的。其次，在快乐是对匮乏的充实层面，柏拉图通过比较身体与灵魂两类匮乏的充实的真实性，由此表明灵魂的快乐更真实和真正的快乐源于灵魂的充实。最后，柏拉图在灵魂和谐层面阐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即由理性统治灵魂各部分所产生和谐带来的灵魂整体快乐。

自然、天道与秩序

同济大学陈畅教授《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辩的三个向度》一文从明代哲学家陈白沙的“学宗自然”出发，探讨了明代哲学家围绕白沙“自然”思想展开的批评、辨析和推进。陈老师指出，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处理的是道与物之间的生化关系；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涉及的是心与物之间的创生性关系；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心与物的政教秩序面向。此上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辩在时间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

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自然与天道：船山哲学中的“终极无为宇宙观”》一文以对船山哲学以建构性运用的为进路，思考了船山哲学中的自然秩序及其运作方式。陈老师表示，船山之“自然”并非意指某种存在，而意味着某种存在方式或运作方式，与有意思、有目的的“人为”相对。更进一步，船山将自然区分为天之天（宇宙的自然）、物之天（物的自然）、人之天（人的自然）。陈老师还强调船山之自然论述有两个特征：一是自然界中合理化与秩序化始终与它们的反结构并存；二是消解作为目的性或意志性造物主的“超自然”的存在。

浙江大学陶磊教授《何为自然：天人合一的三种理解》一文基于人性文明的道德德性追求，以及道德德性与理智德行相区分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三种“天人合一”进行了梳理与新的诠释。老子道家的横向超越，以人性精神的一气旁通来实现。其中，理智的运用很少，且有反智倾向。庄子的横向超越与老子的不同，其丢弃了精神中的人性意识，因此具有向理智敞开的的能力。早期儒家合目的性的自我建构对理智的要求较高，不过理智依然处于从属地位。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对儒家合目的性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理智超越人性占据自我建构的主导地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教授《“幽明一致”中的自然与教化——以朱熹的讨论为中心》一文，围绕理学对“幽明一致”的义理解释，分析了朱熹等理学家如何在理气论架构下重构祭祀教化的自然之理。张老师指出，在理学家从“一而二，二而一”角度的阐发中，幽明生死之间蕴含着理层面的“一”与气层面的“异”两个存在维度，并在不同向度上回应着佛教对生死的态度和知识图景。在自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祭祀原则，将儒家礼乐制度的依据建立在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之上，是对儒家文明内具精神秩序理念的深化。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吴小锋老师的报告为《自然与善：从文字的角度谈谈“善”的古义》，他对历代文献中的“文”“言”“言”“羊”等文字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指出了它们与“善”在文字和义理上的关联。吴老师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通过观察太阳的运动规律，勾稽并言说出阴阳消息的天道，善继承了阴阳之道。善本身意味着对天道的探求与言说，靠住的是对太阳的观察。在对天道的观察中，为人世逐渐莫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罗晓颖教授在《“克服虚妄”：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伦理旨归》中指出，探究自然的冲动始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自然诸元素以及功用深刻吸引自然哲人的理智兴趣。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仅寻求单纯的自然知识，还具有一种伦理旨归。他们试图通过阐释天体运行现象等问题，消除人们对天体、诸神、死亡、病痛，以及欲望等的疑惧，以获得幸福。伊壁鸠鲁在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为根本和唯一的原则后，主张在天象学领域多因解释，源于他构建自然学说时

，在一定程度上洞见了对确定性知识盲信的“虚妄”性。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于璐老师在《西塞罗论自然法与理性的限度》中表示，西塞罗是从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的重要参与者，但目前学界对西塞罗研究存在忽视。通过分析《论共和国》的特有结构和布局，从对话体的角度看待其中相互冲突的观点，于老师指出，西塞罗首次从法学维度深入阐述了自然正当的特征，他意图通过建立自然法的观念以实现一种最高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使罗马的法律思想真正转变为一门科学，将对绝对真理原则和对现实共同体的关注结合起来。

亚里士多德论自然、快乐与德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涛教授的报告是《亚里士多德对快乐主义的颠覆与改造》，李老师提到，亚里士多德区分出运动意义上的快乐和成全意义上的快乐，因此必须与形而上学中运动与成全活动的存在性质的差别联系起来看，快乐问题才能彻底澄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区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快乐，显示出亚里士多德相对于其他哲学家的根本推进。李老师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如何不同于禁欲主义与快乐主义，如何颠覆了大众相信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式的快乐主义，并通过将真正的快乐界定为成全活动而改造和提升了快乐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何博超老师在《论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德性问题》中指出，虽然《修辞术》时期亚里士多德尚未形成完整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但对德性的处理为其道德哲学奠定重要基础。何老师首先处理了《修辞术》卷一中关于利己和利他德性的阐述；其次探讨卷二对演说家品性的界定，指出德性在其中与实践智慧相联系；第三，探究卷三中的措辞德性，揭示其中的“适度”理论；最后总结了《修辞术》的德性具有的四个面向，均为后来的伦理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的胡辛凯老师作的报告题为“《后分析篇》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中的权威意见分析法”。胡老师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尼伦》卷七中通过消解权威意见之间的冲突，寻求关于akrasia的真正定义。对akrasia现象的定义以及相应解释的寻求是对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中科学方法的最好例证。尽管《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没有给出akrasia的真正定义，但已具备定义它的各种元素。《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中的权威意见分析法遵从了《后分析篇》的主要指示，虽然它根据伦理学自身的domain specific norm做了相应的调整与变通。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张霄博士在《亚里士多德城邦“形质论”与自然论》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自然性更应从人的自然而非“形质论”角度来理解，政制作为城邦的形式与公民德性问题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借此意在证明，城邦中谁是公民、谁来统治以及以何种方式统治，将构成政体的差异。人的言语与理性能力由自然赋予

，但若想将理性能力由潜能变为现实则需要后天培育。在此过程中，城邦扮演了其他人类共同体都无法比拟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城邦自然存在。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邓连冲博士的报告为《努斯的分离与幸福——重思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界限》。他主要处理努斯的分离问题，并以这个问题为线索，探讨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界限。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推论，最好的幸福是灵魂合乎努斯的实现活动。因此幸福概念的界限其实也跟努斯概念的界限密切相关。通过考察努斯的分离问题，最终得知努斯并非超越之物，因而建基于努斯之上的幸福概念同样不会超出人性的界限。亚里士多德最终在伦理学上保留了一种仁慈，这在根本上不同于有些哲人，或者有些悲剧作家对人的界限的框定。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王嘉雯博士的报告题为“Play, Mimetic Pleasure, and Fiction in Plato's Laws and Aristotle's Poetics”

，她认为，《法义》中儿童游戏的虚构性并不体现在对现实的反映，对现实的暂时悬置仅仅关注于游戏本身，是柏拉图的模仿游戏及早期教育发生的必要条件。游戏在儿童与成人的过渡地带（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克特）中发生。游戏模仿快乐以及虚构模仿世界既包括反映世界的模式，也包括创造世界模式。后者特别有助于解释《法义》儿童游戏的问题。

礼乐文明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在《差异与同一：〈庄子·齐物论〉的世界观照》报告中指出，《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主题是如何观照世界。庄子认为，在世界万物“吹万不同”的差异样态之下，要以“莫若以明”的思路，让世界如其所是的自我呈现，以“道通为一”的姿态观照世界，超越是非、差异、争执与对待，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物来顺应、随物自化、逍遥游世，以静默的方式与世界“和光同尘”，以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来消解现实差异性带来的观念纷争，这就是“和之以天倪”。

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礼以则天——郑玄礼学的天学依据》一文讨论了郑玄的宇宙论。陈老师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是礼乐文明，而礼乐之所以成为文明，是建立在一套对天地的形而上理解的基础之上。郑玄在天地生成上，以注解《乾凿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气论为主体的天地生成论；在天地结构上，以当时流行的浑天说为基础，在注解《尚书纬·考灵曜》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天地运行说。这些郑玄的“天学”的重要内容，为郑玄的整体的理学建构、具体的礼制理解等等，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孟琢教授在《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对〈中庸〉主旨的新阐释

》中指出，《中庸》的阐释传统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而这两种传统可以在对《中庸》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的理解中得以统合。孟老师通过对《中庸》天道观、人性论和礼乐文明，以及“诚明”概念所作的新探究，对《中庸》的思想主旨作出重新厘定，认为子思面对礼崩乐坏的文明危机，通过对“性与天道”的创造性阐发，为礼乐传统重新建立哲学根基。从而，中国哲学的特质体现为哲学根基与文明传统的契合，并以此为把握《中庸》义理统一性的关键。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刘伟教授在《从形神到形名：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中表示，早期中国思想中“物”的含义在晚周时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形名的“百物”转变为诸子形神之“万物”。刘老师认为，追问这一转变，对理解作为整体之诸子学的思想品格有相当的助益。从整体向个体之物的转变，建立在对于古典神明观念的扬弃或者说转化之上，神明退场后个体观念发生，个体之物成为知觉关照对象。诸子学通过以形体取代形象“发明”了一种新的法度观念，最终指向摆脱神的人，使得关于人和政治的知识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质德、文德与工夫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的报告为《梁漱溟先生工夫论发微》，他聚焦于梁漱溟先生为其所编印的伍庸伯、严立三两家《礼记·大学》解说所作的“叙”，对梁漱溟的工夫论展开探讨。丁老师认为，这篇“叙”至少有四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工夫论必须要有“工夫”相称，二是梁漱溟对伍、严两家工夫的概括可以和西方伦理学传统相发明，三是对《大学》的解释有理有本、完全开新，四是对传统学术形态的反思。丁老师分四个方面对这个文本所体现出的梁漱溟之工夫论进行概括：一是梁漱溟自己概括的伍、严两家的工夫论；二是梁漱溟特别重视身心关系，对身心关系有一个现象学的解释，认为身心分开；三是失眠的问题；四是对传统工夫论的批评，涉及人性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即性与天道）。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教授的报告《从自然德性到教养德性——早期儒家德性论及其与道家的对话》深入探讨了“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李老师通过对《论语》文献的分析，将孔子的德性谱系分为“质德”和“文德”两个层次。“质德”即孝悌、忠信、智勇等自然德性，而“文德”则是仁、义、礼等教养德性。二者并非外在、对立的，而是要以自然德性（质德）为基础，经过提升、统合才能转化为教养德性（文德）。同时，李老师还从《老子》“玄德”的角度来对自然德性（质德）和教养德性（文德）进行反思。之后，又从《孟子》中的论述来解析孟子对道家“玄德”论的回应，并指出孟子实际上是由孔子“文德”论向“质德”回归。



林志猛教授最后对这两天的学术会议做了闭幕总结。林老师表示，此次与会学者的会议论文主题非常集中，对自然、快乐、德性、教化等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交流。中西古典学和经学有很多可以交流互鉴的地方。中国传统讲究天地人秩序，强调制礼作乐和不同层次的德性诉求；古希腊哲学也注重宇宙、城邦与个人的贯通，文艺和音乐对礼法和政制的影响，思索德性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从中西古典文明探讨人的自然本性和快乐，对应对现代道德伦理面临的严峻挑战亦有深刻启发。推动中西古典文明的交流互鉴，有益于现代人思考如何恢复对人之内在优异的渴望，从整全的视角理解人伦秩序和政治秩序，以避免人性滑向自身难以把握乃至无从复返的深渊。